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神游四方

陈平原自选集

陈平原 著

SHENYOU SIFA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陈平原
◎ 著

神游四方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陈平原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游四方:陈平原自选集/陈平原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56-2184-0

I. ①神…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8784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SHENYOU SIFANG

神游四方

陈平原自选集

陈平原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杨林玉
责任设计:王征发 责任印制:何景贤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6 插页 2
字 数 437千
定 价 8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霁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童庆炳

满运来 戴 逸

编 委 会 主 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 委 会 副 主 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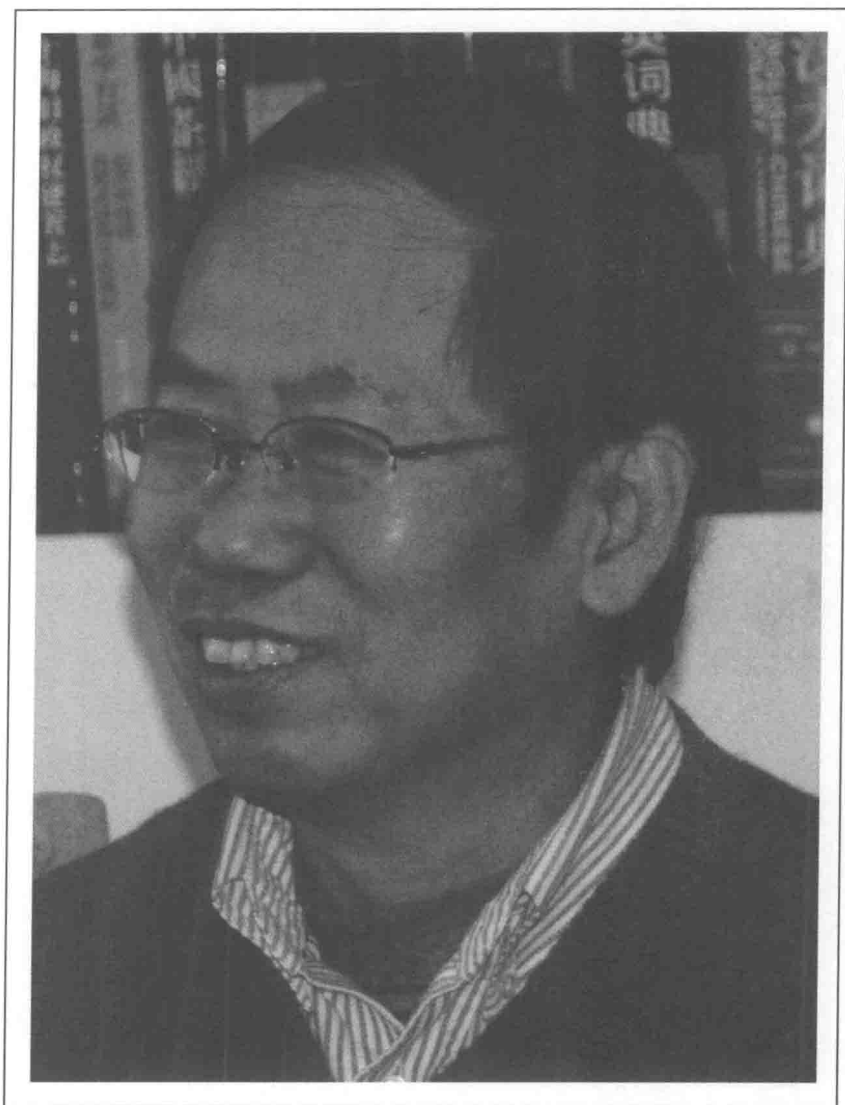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9年11月



陈平原先生

自序

有机会出“自选集”，向中外学界及广大读者汇报业绩，自然是很幸运的事。一编在手，多年的辛劳、奋进与收获一目了然。可这种机会不能太多，理由很简单——你的“得意之作”不可能无穷尽，哪经得起三挑四拣？

1994年应邀为“跨世纪学人文存”编自选集，那年我刚好四十岁，因此，撰写了题为《四十而惑》的“代序”。这套印制精美的丛书，最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推出。此《陈平原自选集》收文14篇，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小说学研究”“学术史研究”及“人文关怀”四个专题，大致体现了我那个时候的研究兴趣与学术水平。

2008年，我为香港三联书店主持“三联人文”书系，这是一套标榜“小而可贵”的丛书，其基本立场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三五篇代表性论文，确能体现其学术上的志趣与风貌；而对于读者来说，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也是一种乐趣。”（参见《“三联人文”书系总序》）其中我的那一册，题为《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仅收四篇在学界大获好评的长文。这本小书，2010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发行了简体字版。

2011年1月，我同时出版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选”，一是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加盟“当代中国名家文库”，编了一册《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象》，选录1996—2008年间刊发的专业论文12篇；一是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约，为其主持的大型丛书“三十年集”编了一册《压在纸背的心情》。后者征得出版社同意，破例不选论文，而是选择了42则长短不一的随笔、序跋、对话或评论，“勾勒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好山好水，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参见《〈压在纸背的心情〉序》）。

有了如此经历，当“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向我约稿时，我在深感荣幸的同时，确实是“诚惶诚恐”。既不想重复选文，又不能糊弄读者，只好另辟蹊径，确定了“以著作作为主轴”的编辑思路。也就是说，在“论文精选”之外，更希望兼及我已刊各书，呈现不同的学术面向。

如此“以文带书”，既凸显自家学术业绩，同时也是为了回避上述选本。比如，第一辑“文学史”希望推介《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时题为《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2004年起改为此题）、《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四书。第二辑“学术史”呈现的是以下四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三辑“大学史”则选自《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读书的

“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四辑“都市、画报与声音”有点庞杂, 所收四文指向《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 三联书店, 2008年)、《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 三联书店, 2008年)、《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 三联书店, 2007年)。十六文代表已刊十六书, 大致体现了我已经取得的学术业绩。只是为了平衡体例, 第一辑不免多有删减, 而第四辑则有待加强。之所以这么编, 是为了体现自家学术上的“方向感”, 或者说预留了发展空间。

我曾经感叹, 在学问上, 前辈学者大都谦卑而执着, 这跟他们的个人修养、也跟他们所处环境有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自我表彰”成了当代中国学人的基本功与必修课。每天都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创新、突破与贡献, 实在让人难为情。可说着说着, 习惯成自然, 很多人也就不再脸红了。更让人惊叹不已的是, 这种“自吹自擂”还很有效果, 以至在当代中国蔚然成风。

明知学术史上的贡献, 不该由当事人自己来总结, 可又无法遗世独立, 只好采用变通的方式, 必要时抄录获奖纪录: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获教育部颁发的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1995)、《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三等奖(1998)、《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获教育部颁发的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获教育

部颁发的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13)。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成果奖”，被认作是文科学者所能获得的最高奖励。这种学术奖励至今共颁发了六届，只是名目不太一样，第六届起方才统一了名称。我的获奖作品，前四种乃著作，后一种为论文[收入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属于集体项目，或日后获教育部奖，就不再重复开列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大学史研究，因闯入了另一个领域，获得同行的认可很不容易，故《中国大学十讲》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0)，还是很让我高兴的。

想给“自选集”起个好书名，实在太难了，因不只一个专题，无法“一言以蔽之”。用三四个关键词来串联，中间加顿号，那是偷懒的办法。想来想去，似乎只有“神游四方”比较合适——既表明读书人的心境，又切合全书的分类，还隐含了跨越学科边界、自由驰骋于天地间的学术野心。

2013年11月13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有情怀的学术研究*

——答北京大学研究生杨早问

问：首先想请你谈谈，你是如何走上治学之路的，哪些人与事对你影响最大。

答：作为“文革”结束后公开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我的“治学之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们七七级；以我的愚笨，如果连大学都上不了，整天拿锄头修理地球，不可能知道学问为何物。在这个意义上，对我的治学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高考制度的恢复。另一件深刻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取向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自知无力高瞻远瞩，唯一的好处是借助与历史的对话，不断校正自家的立场与思路。你问谁对我的治学历程影响最大，这很好回答：一是我的父亲，他使我建立起基本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一是我念博士课程时的导师王瑶先生，他让我拓展学术视野，也谨慎自家的脚步。这些，我在《书生意气》、《茱萸集》等随笔集中屡有追忆。

问：十五年前，你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

* 本文初刊《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

当即在海内外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现在回头看，这篇论文是否受当时“方法热”的影响？你自己是否满意这种研究方式。

答：我一向主张“小题大做”，这篇博士论文便是一个尝试。1898年到1927年，是中国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阶段，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发。选择“叙事模式的转变”做文章，是因其特征最为明显，且涉及面较广。当然，强调“形式革命”，也不无对以往过分强调“内容层面”的研究进行反拨的意图。在论述过程中，确实借鉴了叙事学等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但我以为任何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与对象有效结合，方才值得称道。可以这么说，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这本书上篇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国内学界对此甚多好评；但我自己和国外学界更注重下篇，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小说演进中的作用，尤其论述游记、轶闻、书信等次文类的渗透对小说转型的影响，以及“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对小说发展的意义。就对此后学术风气转移的作用而言，下篇的影响可能更深远些。这本书对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关系的论述，打破了原有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隔阂，体现了当初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设想。而将中国古典小说作为研究的前提与背景，在注重古今变迁的同时突出文体演进的内在动力，使此书同时得到古代、近代、现代文学界的认可。日本学者对这一点非常敏感，所有书评都提到这一研究思路的意义，认为此乃“今后研究的出发点”。

问：《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从体例上看是比较新颖的，与以前一般的文学史很不一样，所谓“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原则，在具体写作时是怎样贯彻落实的？

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决断去取”，因为本书的拟想读者是专

家学者，所以更多考虑新意与深度，而不必重复“常识”和“定论”。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论述的重点不在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的功过得失，而是整个小说史的发展线索，突出演变的脉络，在描述小说发展线索时兼及具体作家作品，但不为某一作家作品设专章专节。这就是我所说的“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而且，小说史不同于文学史中论述小说部分的集合，我认为应该以小说形式的发展为重心来展开论述，比如讨论当时的文化氛围，主要扣紧其如何影响小说形式演变来谈。第五章开始，都是专门讨论形式问题，谈结构、文体、叙事观点、主题模式、审美特征等。但这不等于“新批评”那种纯粹封闭的“形式”，而是从形式变迁入手，努力寻找并解释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因素。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来展开论述的文学史，对我很有启发。抓住主要文学现象也就抓住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魂”。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我关注的主要是小说的形式特征，其次是影响这些形式特征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当我描述这段文学历史时，学术思路以及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博取杂用，守旧出新”——这也是我整个的学术追求。

问：1992年，《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出版，这本著作涉及当时大陆学者很少关注的通俗小说领域。但是，就方法而言，这本著作又是后来你对小说采取“类型研究”的一个滥觞。请谈谈它在你的治学历程中的意义。

答：《千古文人侠客梦》全书共九章，1~4章描述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5~8章研究武侠小说的类型特征，第9章为全书总结。附录两篇，谈论“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武侠小说与类型等级”。从类型的角度思考武侠小说，主要是寻找其“恒定因素”与“主要手法”，发掘这些基本叙事语法的文学及文化意义；从通俗文学角度出发，理解而不是埋怨其表现手法的程式化，进而解读“程式”中蕴涵的“无意识

内容”；将“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来考察，理解其拯救他人与拯救自我的双重功能——这三者，构成了这本书的论述框架。这部著作研究通俗文学，不同于此前常见的居高临下：不再以文人叙事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是努力理解通俗文学的特性，在准确描述其基本叙事语法的前提下，再作出评判。考虑到此前学界对待“小传统”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信口开河，本书的这一特色，比较容易为人所觉察。而选择类型学作为切入的角度，理论色彩比较强。一般读者比较关注前半部对于武侠小说的历史描述，专家们则更看重后半部的类型分析，认为其提供的结论，甚至可以用来解读游侠诗歌或武侠电影。从写作意图看，是试图将小说形态学的研究与文化发生学的探讨结合起来，力图沟通文学的“内”与“外”，这使得本书的阅读与阐释，超越文学研究界。这种“跨学科的眼光”，或许是其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问：在连续出版了以上三种著作后，你撰写了《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似乎是为你的小说史研究做一个总结，是这样吗？

答：同是小说史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着眼于引进叙事学理论和突出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力图全方位综合把握一段文学进程并创建新的小说史体例，《千古文人侠客梦》则希望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提供一个小说类型分析的范例。至于三书共有的打破目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不合理的时期划分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缺失，更是延续或修正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设计。在撰写小说史过程中，我个人的理论思考，都汇集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因为是治史中的理论思考，所以特别注重史家的个人感受以及可操作性。不追求体系化，也没能给出理想的答案，只是追询那些现有理论无法涵盖的“变异”，描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陷阱”，甚至表白史家的“迷茫”与

“困惑”。此书既非思辨程度很高的理论陈述，也非实证色彩浓厚的史学专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力图认真思考的文学史家的工作笔记。如果硬要自我评估，我只能套用“有长有短”这句老话：短处是不完整，好多该说的话没说；长处是真切，好多没体会的话不敢乱说。

问：王瑶先生去世后，你从他那里接过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这一工作，现在这本书出了“二编”。关于这个工程，请谈谈其意义以及工作过程中的得失。

答：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颇多建树，值得专门总结。一百年的学术史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传统”，对这一传统的隔膜与误解很容易产生虚无主义态度或热衷于横扫一切的偏激。因此亟需认真研究这百年来的学术实践，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规范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及二编选择30多位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以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精神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学术成就。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这个课题，是试图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可惜天不从人愿，王瑶先生最后还是没能见到此课题的真正完成，他计划为此撰写的“导论”也落空了。

在今年出版的“二编”中，我们就“初编”中的问题，做了若干调整。比如，所请作者不像原先限于本课题组成员，而是广邀各路豪杰，而且不论资历深浅，惟贤是举。又如，近年我们对晚清学术变革的趋向有了较多的了解，对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框架略有反省，更强调古今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峙”。所以我们补选了刘师培和黄

侃这两位治学“旧中有新”的大家。本课题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为每位大家找到合适的研究者，因需要既了解研究对象的脾性、思路与学术贡献，又能保持史家的独立判断，不为私人感情所左右，这点很不容易。出于宁缺毋滥的考虑，只能将周作人等几位计划中的人物暂时搁置，如此继续保持此书的“开放状态”，只能寄希望于日后的进一步完善。

问：199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未成书前就已在《学人》、《中国文化》等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有评论称“对于近年中国学界之注重学术史研究，起了引导的作用”。

答：在我的学术论著中，这本书写得最艰难，从1991年写到1997年，行程竟六年有半。而且，这本书是我在北大讲授三轮“现代中国学术史”和两轮“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中间不断地停下来反省和思考，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理解与超越、温情与冷峻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简要地说，这本书在“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双重视角的观照下，凸显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研究模式的变化，一改此前过分依赖西学冲击而相对忽略传统内部变革动力的论述策略，进而挑战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的研究思路，兼及考据与思辨，借助于求是与致用、专家与通人、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巨大张力，讨论传统中国学术在“走向专门家”之路所作的自我调整，以及所面对的两难困境。相对于面面俱到的铺陈，此类深入骨髓的探究，有可能为今日学界的选择提供必要的借鉴。在本书的撰写期间，《学人》诸同仁对于学术史的共同兴趣，对我形成巨大的压力与无声的催促，使本课题不致半途而废。这是值得感谢的。

问：《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出版于1999年，分为“文学史叩问”、“小说史叙述”和“大学史寻踪”三辑。我的理解：这本书是用学术史的

思路观照文学史、小说史和教育史，探讨这些专门史如何被书写和被接受，并主要关注专门史中的外部环境研究。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

答：“重写文学史”是我的本行，此前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以及本书第二辑诸文，大致体现我的志向与兴趣。“文学史叩问”中的篇什，则与《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书一脉相承，目的是追问作为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这种对学科根基的反省，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了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更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密切相关。而关注“中国大学百年”，不管作为话题，还是作为文章，既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如能将教育、思想、学术熔为一炉，探讨20世纪中国的一个侧面，这个课题，大有开掘的余地。这本书体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尝试，没能充分展开，但好在都有自家面目。

问：北大百年校庆前后，你连续推出《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以及与夏晓虹老师一起主编的《北大旧事》，以致屡屡被外界称为“校史专家”。其实你和一般的教育史家显然不同，你曾提到，大学应该是“所有文化人关注的对象，并非只是教育家的专利”，所以你的主要着眼点是教育体制与学术思想的关系。请你谈谈这一点。

答：我所感兴趣的，不只是北大校史，更包括前人对于北大校史的叙述和阐释。比如，我把北大的历年校庆作为一种文本来阅读。从20周年纪念起，每次校庆几乎都用一个口号来诠释“北大传统”和“北